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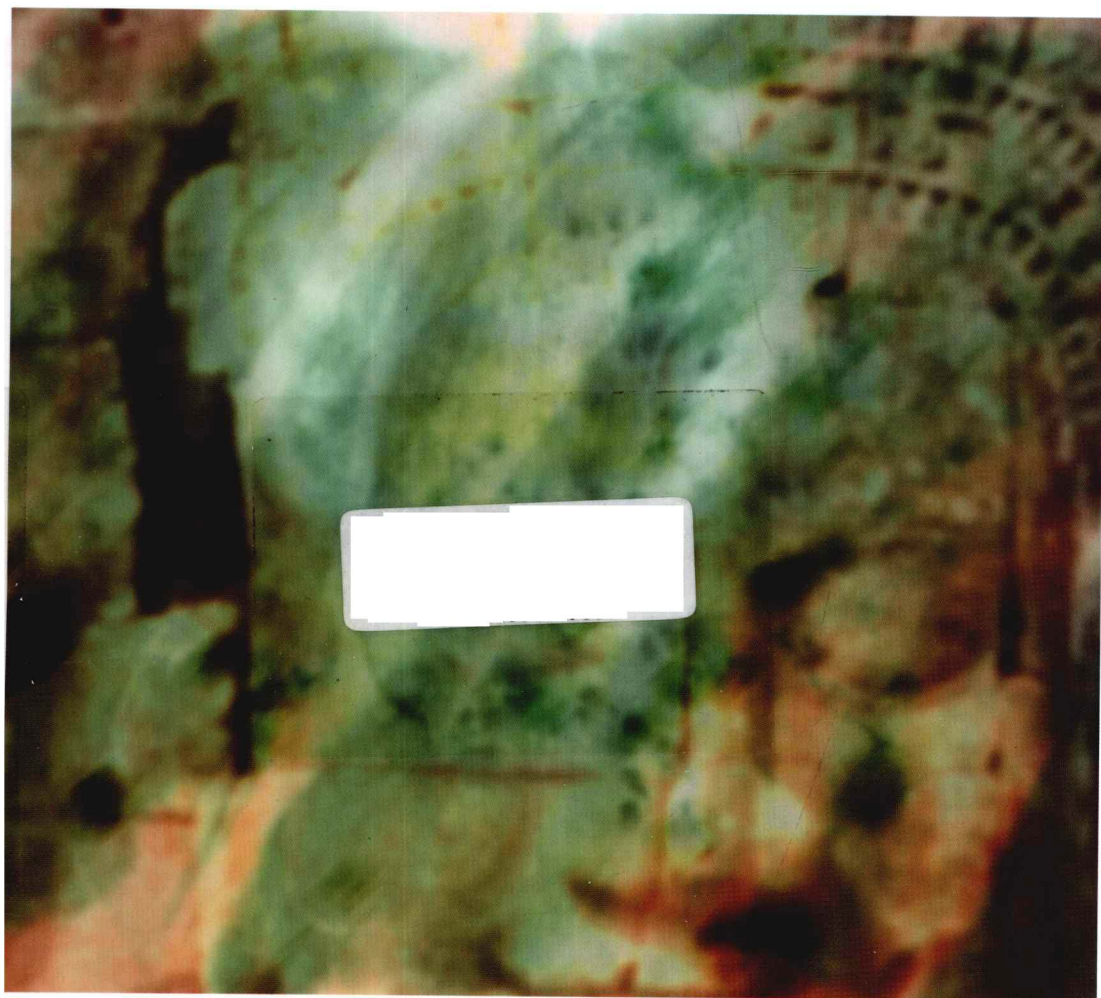
IXUOXI

东君短篇小说选集

恍兮惚兮

東君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EXULXI

东君短篇小说选集

恍兮惚兮

東君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恍兮惚兮 / 东君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12

(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五辑)

ISBN 978-7-5339-3509-2

I. ①恍… II. ①东…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5142号

责任编辑 冯静芳

装帧设计



恍兮惚兮

东君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224千字

印张 17

插页 1

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509-2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001	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
026	我能跟你谈谈吗？
047	听洪素手弹琴
067	黑白业
090	范老师，还带我们去看火车吗？
114	先生与小姐
135	相忘书
152	恍兮惚兮
169	张生是一条鱼
190	鼻子考
211	昆虫记
225	回煞
242	拳师之死
256	官打捉贼

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

我听那些老人说：

“一切美好的东西

都像流水般地永逝了。”

——叶芝

去年初春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在静安寺附近一家旧书铺淘书时，意外地接到了所长打来的一个电话。我合上了手机盖之后，闭上双目，激动得几乎要喊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脏话来。我模糊地意识到，从我接完电话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命运将会发生可以预见的变化。不，我并没有在那个研究所里得到提拔，也没有涨一级工资什么的。对此，我从未有过奢求。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另一回事，而这种事对一个书呆子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回到家中，我仍然难掩兴奋之情。泡上一杯清茶，打开电脑，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这样一行没头没尾的文字：静安寺。苏静安教授。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第二天上午，我就根据所长提供的电话号码，与那位素所仰慕的国学大师苏静安教授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他的首肯与悦纳。也就是说，这一次我将欣然接受所里委派的任务：在苏静安教授退休之后，长期随侍左右。说起来，我与苏教授之间尚有一段不浅的文字因缘。读大学时，我就喜欢读苏静安教授的书。有一回，听说他要到历史系讲论中国古代神话史，我便夹着他的几本著作，兴冲冲地跑过去旁听。那时，苏教授还是六十刚出头的模样，头发半白，穿一身古雅

而又素净的蓝布衫。上课之初,他劈头第一句就是:我上课,你们大可不必拘谨。第一,你们可以抽烟,因为鄙人也是爱抽烟的;第二,你们可以在半途逃课、打瞌睡,我愿意理解为那是因为鄙人的讲课内容枯燥乏味,你们根本就不想听;第三,我会留十五分钟时间,让你们提问或反驳。苏教授的课格外受欢迎,自始至终,笑声和掌声不断。苏教授给我的印象是:刻板而又风趣,放诞而又内敛。记得在那天课堂上,我还给苏教授画了一幅漫画。我在画中极力凸现的是一副大号的眼镜,一条热气腾腾的舌头,以及那根取代手指的雪茄烟。苏教授的书一直伴我至今,而且每一次重读都能获得新意。但凡他出了新书,我都会买过来放在床头。我甚至不想一口气把它读完,而是每天浅尝片刻,给次日留下些许兴味。去年年底,我在一家权威的学术期刊上读到一位著名史学家写的一篇文章,那位史学家对一个冷僻的古汉字妄加猜详,被我逮个正着,于是我就随手写了两千余字来阐释那个古汉字。我把文章发到那家刊物值班编辑的电子信箱,后来竟被原文照登,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响。有几位学者还通过电子邮件找到了我,跟我谈起高深的问题来。事实上,我只是侥幸比别人多认得一个冷僻字,人们却莫名其妙地在我的名字前面冠上了“资深学者”的称号。这让我多少有些羞愧。我们的所长偶然看到了我写的那篇文章之后,特地把我找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与我兴致勃勃地探讨那个失考的古汉字。在交谈中,我毫无避讳地向他承认,这些学问其实都不是我的,而是得自苏静安教授的一部旧著。谈到兴头上,我还把一份关于苏静安著述的论稿拿给他看。苏静安,所长转动着手中的铅笔,带着回忆的口吻说,他早年毕业后就分配到我们这个单位,比我还早几年。他是一个怪人,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带着一把水果刀与情人约会;还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带着一本《微积分》来上班。刀与书,自然从未派上用场,但他喜欢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放在布包里。从所长口中,我听到了不少关于苏教授的掌故,这使我更激起了要去了解他私生活的兴趣。我没想到所长后来竟会帮我联系到苏教授,还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份称心的差使。我随侍苏教授,既可以照拿单位的工

资,又可以问学,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从前,最让我头痛的事莫过于,在单位里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可有时外出办事,还偏偏会有人來找我,想偷懶都不行,好像我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些找我办事的人而活。现在好了,单位里那些缠死人的破事,可以像穿烂的鞋子那样被我甩掉了。

第二天上午,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梅竹双清阁”。苏教授跟夫人各据一个案角,正在一边看报纸,一边吃早餐。他让保姆带我先进书房稍待片刻。书房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书橱中有很多书都外加蓝布书套,显得格外珍贵。除了书,最惹人注目的是各式各样的闹钟,它们的时间都不尽相同,有快点的,也有慢点的。其中只有一个闹钟的时间跟我的手表是吻合的,指向的是上午八点零五分。走近细瞧,我才发现每个闹钟的一角还写有几个蝇头小字:巴黎时间、柏林时间、罗马时间、东京时间、纽约时间、布拉格时间、雅典时间、里斯本时间、阿姆斯特丹时间、马德里时间、伦敦时间、维也纳时间、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我如果记得没错,这些城市都曾出现在苏教授新近出版的一本游记中。在那本书的序言中,他还曾这样写道:有书的地方,世界就向它聚拢。这个书房与别书房不同,它有着独特而又浓重的个人气息。它是苏静安的。每个闹钟里标示的国际时间、墙壁上悬挂的世界地图以及卷帙浩繁的外文版书籍,让人觉得他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顾盼之间,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抬腿就可以横跨欧亚大陆,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古希腊文明的源头。我翻书的时候,苏教授走了进来。他向我了解了一些个人情况之后,吐了一口烟说,我看过你写的几篇文章,还算不错,可是,你不要太得意。我连忙点头称是。苏太太也随后过来,递上水果,显得礼貌周全。苏太太要比苏教授小二十多岁,年近五十,身上却透着某位曾经为之动容的诗人所形容的“陶罐般的静美”。苏太太坐在我对面,让人感觉她就是老照片中的那种人物。阳光透过窗帘折射出一道淡黄的光晕,如同那种暧昧难言的目光,混合着清晨时分咖啡的奇异的苦香,仿佛那就是阳光的

味道。苏太太原本是苏教授带的硕士生,曾在他的指导下翻译过马拉美、波德莱尔等人的诗。因此,我的话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涉及法国诗歌。苏太太说她嫁人(苏教授)之后,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读法文诗了,也不谈波德莱尔之流。现在她谈得最多的是麻将经。苏太太搓得一手好麻将,而且在大学教授的太太们中间,是以牌风好出名的。苏教授见夫人跟我谈麻将,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你还是去搓你的麻将。苏太太白了他一眼,就走了。

苏教授把一本新书塞给我,不屑一顾地说,王致庸的弟子真是没法治了,好好一篇文章都叫他给歪解了。由于激动,他的嘴角出现了过多的唾沫,但他很快就用舌头舔掉了。苏教授接着就把原书拿给我作对照,并且要求我替其中一个篇章作些注解。我知道,他这样做是在试探我的深浅。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头痛的事。在印刷术日益高明的今天,横排简体字显得那么爽心悦目,若是有什么缺陷也是一目了然。但竖排、繁体、尚未断句的古书就显得格外烦琐。

笺校一篇之后,我就战战兢兢地把它拿给苏教授看。苏教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很有耐心地指出其中一个讹脱之处。借此机会,我大着胆子向苏教授提了一个带有私人性质的问题:听说你早年跟王致庸教授在我们这个研究所共事过,后来好像因为某个哲学问题上的分歧而翻脸,有这回事?苏教授没有作出正面回答,他指着墙上的闹钟说,这道理很简单,一只闹钟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现在是几点钟,但两只闹钟有时却无法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时间。在我的正对面,一只闹钟的指针指向的是东京时间,另一只闹钟指向的却是巴黎时间。

跟王致庸教授一比较,苏教授就来了精神。二人年龄相仿,都已经是年逾古稀了,但苏教授声称自己的老是“老当益壮”的“老”,而王教授的老是“老态龙钟”的“老”。他说这话时,脸上显露出一种孩子气的老态。苏教授又作了进一步比较,今年年初,王致庸教授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向校方提出退休,而他,却是因为“要给后人留下几部大书”而主动提出退休。因此,苏教授认为自己的退

休与王致庸教授不能同日而语。苏教授说,退休,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一生的终结,但对他来说,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才刚刚开始。苏教授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晚年生活:独自一人坐在一个没有腥臭味的墙角,晒晒太阳,舒畅地呼吸;或者是与一大堆毫不相干的老人坐在老年宫里,搓几圈麻将,杀几盘棋。苏教授毕竟是苏教授,在我面前依然是一副神采奕奕、雄心勃勃的模样。

谈到工作,苏教授把自己的一份工作计划书交到我手中。我翻了翻,不由得大吃一惊。我还只有七十四岁,苏教授说,我可以花五六年时间重新梳理《十三经》和《廿四史》,到我八十岁那年,我要花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思想史,到我九十岁的时候,我还要动笔写一部回忆录。照此计算,苏教授至少得活到一百岁,其间还不能生病。从那本计划书中,我发现,苏教授把时间分成了几个大块,这些大块都以年来计算;大块之中又分若干小块,以月来计算;小块之中再分小块,以日来计算;一日之中,有几个时间段是固定不变的:晨练、午睡、喝下午茶、做蓝布书套。其余大部分时间则被读书与写作占用。下午四点钟,也就是东京时间下午五点钟,巴黎时间早上七点钟,苏教授开始放下手中的书,关掉书桌上的台灯,转身来到厨房,把一壶煮热的咖啡提到书房,沏上两杯,然后又把其中的一杯递给我。半个小时后,苏教授又开始工作。他的内心仿佛有一个十分牢固的框架,可以把一些分散的事物框住,使之变得有章可循。

是的,苏教授是一个很讲究生活规律的人。他的昨天是怎样开始或结束的,他的今天大抵也就是怎样开始或结束的。他的一天始于咖啡,终于牛奶。他每天坚持的一些生活方式不会轻易改变。但退休之后,他的生活有了微小的改变。首先改变的是路线。他从前都是坐着地铁四号线,转三号线去学校上课,课后沿原路返回。现在退休在家,这两条线路就从他的生活中撤离出来了。起初,他有些不习惯,有时走到地铁口,一摸口袋,未见交通卡,才发觉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去上班了。为了平衡这种不适感,苏教授每天太阳出来之后,就开始出门散步了。苏教授说,在我的前半生,写作带来的快乐是由双手赋予的;在我的后半生,散

步带来的安宁是由双腿赋予的。苏教授的散步方式与别人不同,他是倒着行走。那样子就像是重新学会走路。苏教授早些年是一个“思想上要求进步”的人,现在却对“退”字颇有研究:退。退休。倒退。退一步海阔天空。敌进我退,敌退我扰。韩愈,字退之……苏教授每天倒退行走的时间要比前进的时间多。他从那栋“梅竹双清阁”出门,就开始倒退着从竹林路出发,途经音乐厅、科技馆、少年宫,一直走到大广场,然后又从那里按原路返回。整个过程就像录像中的倒带镜头。在笔直前行的时间中,苏教授坚持倒退着走回家中,那一刻,闹钟刚好指向七点。每次来回一趟,总得花上个把小时,这正好是太阳的能量抵达地球的时间。我问苏教授,为什么会喜欢倒退着走路?苏教授带着风趣的口吻说,前面就是死亡,我只好背过来看我的前半生。

周末傍晚,有位教授夫人打来电话,约苏太太到一家新开的菜馆吃饭,饭后照例要打通宵麻将。保姆小吴已烧好了二人的饭菜,不能浪费,苏教授索性就留我吃饭。我去厨房打饭时,瞥见砧板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我想把它拔掉时,小吴阻止了我。她轻声告诉我,苏太太每回出去搓麻将都要在砧板上插上菜刀。我不明白,搓麻将与插菜刀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不便多问。

桌上是清一色的素菜。我在苏教授的书中早就了解到,这些年他一直坚持吃素。苏教授问我是否吃得惯素菜,我说能吃上这么一桌可口的素菜,对我来说几乎就是一种礼遇了。苏教授听了很高兴,一边吃饭,一边向我介绍吃素的好处。食素者大都心气平和,苏教授也是如此。苏教授说,吃素食,养草木心,是可以益智的。我顺便问他,师母是否也吃素。苏教授说,我不信佛,但吃长素;老伴信佛,但平素吃荤,只有逢初一或十五的时节吃素,也就是我们乡下说的“朔望斋”。苏教授接着又指着一碟咸秧菜和豆腐乳说,我每餐都少不了这两样东西,我活到七十岁之后,口味越来越像我的父亲了。苏教授的父亲是一个乡下的菜农。

苏教授谈完了自己的家人之后,又夸起了保姆小吴。他说小吴虽然读书不多,但心灵手巧,什么事一教就会,像做素菜,就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我向小吴请教做素菜的手艺时,小吴却避而不谈,好像做灶下婢原本就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她更愿意跟我谈论报纸上的逸闻趣事。

苏教授喝完一浅杯酒之后,带着微醺来到书房,关上了门。小吴告诉我,这个时候,苏教授又要开始做蓝布书套了。我见过那些蓝布书套,每一本都是有棱有角的。我问小吴,能否过去看他如何摆弄?不行,小吴代替苏教授答道,苏教授做书套的时候就像一个乡村裁缝,他总是关起门来,好像生怕别人学会了他的手艺。我笑道,这不奇怪,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小吴竖起一根筷子说,你能教我写诗吗?我说我只会读诗,不会写诗。小吴轻轻地噢了一声,接着感叹说,有知识真好,每天可以坐在房间里看看书、写写字,也不用去管蔬菜的价格。她说这话时目光中流露出一种对知识的崇拜,说得更直接点,她崇拜的是知识的化身,也就是苏教授本人。小吴说自己待在苏教授身边倒是学到了不少知识。因此,她宁愿做苏教授的仆人,也不愿待在乡下做一群家畜的主人。

我无意于探究苏教授的隐私,但每一次小吴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之际,我就颇费猜想了。我注意到,小吴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而这个形象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是吻合的。拖地、择菜之余,她偶尔会向苏教授请教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而她对那些网络或电视稀释过的日常知识也有着异乎寻常的领悟能力。她用满口的“知识”平衡着手中的青菜和拖把,让人感觉她不是一个简单的乡下女孩。这个不简单的女孩子有着不简单的表现。渐渐地,我发现她有意无意地在拿自己跟苏太太作比较,她学会了苏太太抽烟的姿势,学会了她的慵懒和忧郁。有时一场绵绵细雨都能让小吴躺在沙发上忧郁半天,或是躲在厨房一角暗自神伤;有时来了兴致,她就穿上苏太太穿旧了的旗袍,软绵绵地斜靠在厨房的门口,冷不丁地吐出一句文艺腔十足的古诗。据苏教授说,这些其实都是苏太太调教的结果。我不明白,苏太太为什么会有闲情逸致,把一个乡下女孩调

教成一个小文青,而且彻底改变了她的审美趣味: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她告诉我,她发现自己忽然喜欢上了老男人脸上的皱纹,在她眼中,每一道皱纹就是一段深刻的箴言。

礼拜天上午,苏教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有几个得意门生结伴过来看望他,让我也过来结识一下。我进门时,屋子里已是一片谈笑声了。门口的一个雕花木架上搁着一盆百岁兰,两片修长的叶子犹如长须拂地。显然,这是苏教授的弟子们送来的。苏教授给我介绍了一圈之后,又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虽然高矮胖瘦有别,但有一点却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跟老师一样,说话的时候通常喜欢舔嘴角。苏教授舔嘴角大约是为了清理唾沫,他讲到动情处,嘴角便跟螃蟹似的吐沫,然后飞快地伸出舌头舔掉,以免口水四溅。但他的弟子仅仅是为了舔嘴角而舔嘴角。即便没有唾沫,也要伸一下舌头。这已经成了一种遗传般的习惯。

苏教授的几位弟子大都留过洋,留过洋就不一般了,一室之内,谈的都是世界性的问题:美元。欧元。石油。股票。核武器。中东局势。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最新消息。等等。有时夹杂几句英语、西班牙语或法语什么的。谈完了天下大事就开始谈国学,给学术界的几位老前辈评定甲乙。他们排来排去,总也忘不了把苏教授放在国学大师的行列。苏教授听了哈哈大笑,声称自己还不能位列仙班,真正堪称大师的,是他的老师朱仙田教授。论辈分,我们理当称朱老先生为“师公”。“师公”已有九旬高龄,前阵子得了肺癌。一个被学界称为“灵魂人物”的学者,不能容忍自己躺在病床上,成为病理学意义上的人,他渴望自己早日死去,化为一片精神的清风。苏教授谈起朱仙田先生,神情一片黯然。他说,朱老师是我大学时期的恩师,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有一啖饭地,一栖身处,便可以埋头做学问了。从我进大学之后就知道他在学校后面的一座老院子里住着,至今未曾搬过。学校分给他一套小楼房,他也不要,他说人老了就变成树,一挪就死。朱老师还有一个怪癖,我当他助手时,发现他常常把一些重要或是自以为重

要的东西放在一个小阁楼里,从来不允许别人窥视。他的腿即便坏了,也情愿单独一人拖着一条瘸腿,弄很久,才翻找出自己所需之物。我至今仍然不知道他在那个阁楼里藏了什么宝贝。说到这里,苏教授忽然把目光拉远,沉吟半晌说,朱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沦丧十分痛心,我至今依然记得,他当年在先贤祠的庭院中抱着几块残碑痛哭流涕的样子。苏教授谈起老师的语调令我们十分动容,于是大家就提议去看望一下抱病在床的朱老先生。

我们坐车去医院的途中,有人打来电话,说朱老先生已于下午两点二十八分与世长辞。苏教授对正在开车的弟子说,你把车开回我家一趟。我们不知道苏教授为什么会半途而返。回到家中,苏教授进屋关了门。我们就在屋外的树荫下抽烟聊天,干等着。过了片刻,他就出来了,换了一身黑色的中山装。苏教授说,我穿上这样一身衣裳才合乎弟子之礼。

车开往殡仪馆的路上,苏教授就坐在前排位子上指指点点。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对去殡仪馆的路线居然十分熟悉,而且知道哪条路是捷径,哪条路可能比较拥挤。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参加葬礼多了,也就把路线熟记于心了。苏教授一到场,一群守候多时的记者便簇拥过来。苏教授舔掉了嘴角的唾沫,对着麦克风说,我可以十分痛心地告诉大家,朱老师走后,有几门绝学也跟着他远去了。一个由他打开的古老世界,现在也由他关闭了。那个世界变得陌生而遥远,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会有人重新开启,也不知道它是否就从此永远关闭。苏教授评价朱先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绝学大师”,他发愿要写一篇长文章来阐述先生的学术思想。采访完毕,记者们又向另一处聚集,围在中心的便是苏教授的同门师兄王致庸。他是个考古专家,曾师从朱老先生研究过契丹文。但苏教授一直瞧不起此人,认为他做的是死学问、伪学问,尤其不能宽恕的是,他还抄袭过老师未曾发表的文章。苏教授把我们拉到一边悄声说道,挖土挖得浅一些的,是种番薯的老农;稍深一些的,是掘墓人;再深一些的,就是那些考古专家了。王致庸什

么活也没干成,只是把泥土翻了一遍而已。苏教授的弟子都很敬重自己的老师,反过来,凡是老师瞧不起的人,他们都一致鄙视。他们看王致庸的目光就是苏教授看王致庸的目光。

王致庸教授也看到了苏教授,出于礼貌,他上来打了一声招呼。说起近况,王致庸露出神秘的微笑,说自己近日转移了研究方向,开始研究喷嚏、饱嗝和放屁之类的医学问题。有时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并不比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更成熟,他们活到这个岁数似乎都有点返老还童的意思了。如果不是有几位老教授过来插话,他们之间或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口舌之战。就在苏教授跟大家谈论五四前后学术思想的变迁时,王致庸却在一旁面色庄重地谈论着自己对放屁的研究心得。苏教授捂住了鼻子,带着厌恶的表情转到了另一边。因为是群贤毕至,朱老先生的家人早已把笔墨纸砚准备妥当,请苏、王等几位教授写几个字。王教授用契丹文写了一幅,苏教授用梵文写了一幅。还有几位老学者写的是吐火罗文、八思巴蒙文、东巴文、阿拉伯文。这些失传的文字仿佛在朱老先生死后忽然又复活了。我是一个字都认不得,有些羞愧,但我可以猜想这些文字都有着寄托哀思的意思。

上午九时,我刚踏进“梅竹双清阁”,苏教授就把一份报纸愤然地掷到我面前,说,里面有一篇朱老先生逝世的小报道。我不知道苏教授为何动了痰气,就带着好奇心把报纸拿起来看。报纸上长篇累牍都是有关欧洲杯的报道,而朱老先生逝世的消息只有一小块,放在毫不起眼的左下角。新闻标题赫然写着:著名语言学家朱仙田教授昨病逝。副标题:临终嘱托家人要把新书稿费两万元捐给慈善机构。正文还有一段文字,说某某出版社社长已经慨然作出允诺,要践行朱老先生的遗嘱。苏教授说,今天一大早,朱老先生的长子朱温故就打来电话,声称老人家压根儿就没有留下这样的遗嘱。临终前他仅仅是挥动拳头说了几句激愤的话,其间还夹杂着三两句粗话,谁也听不清他在骂谁。而后便是昏迷,血压

高达二百四十毫米汞柱。苏教授立即找那位记者对质,记者着了慌,又把皮球踢给了出版社。出版社的社长说,朱老先生的稿费没有两万元,只有一万元,如果家属没有异议,他们会遵照“遗嘱”捐给慈善机构。至于那份“遗嘱”是谁发布出去的,只须质询一下朱老先生的次子就一清二楚了。这里面的事有些蹊跷,苏教授不想深究下去,也不想插手多管。但这事显然没有就此了结,没过多久,朱温故又打电话给苏教授说,捐款的事虽然未经朱老先生本人和家属(主要是长子)的同意,但毕竟是捐给慈善机构,他们也不想为此跟出版社多加计较。再过了一会,出版社社长又打来电话,说朱老先生的长子这回不要那一万元的稿费了,可他不晓得从哪里了解到出版社还有一万元的版税未曾付给朱老先生。社长解释说,考虑到朱老先生的书出版之后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读得懂,因此限定印量极少。社长进一步解释说,版税是由图书定价、发行量、版税率决定的。一句话,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的。朱老先生的书没法在主流市场上发行,仅有国内少数几个图书馆和研究机构购买或收藏,因此他的家属今后也不会拿到多少版税。苏教授开始压低声音,跟那位社长谈起了一笔交易,经过反复权衡,他们最终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放下电话,苏教授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叹息。他随后又给朱温故挂了一个电话,说他已经跟出版社交涉过,一万元的版税将作为一次性稿酬打到他们的户头。

此事敲定,苏教授走过来告诉我,朱先生当年曾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接济过他,而现在,朱老先生一家老小的生活很不景气,他自然要尽己所能帮他们一把。眼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一本新书交给那家出版社来出,并且将由出版社划出他的一万元稿费汇给朱老先生家属。最让苏教授惋惜的是,朱老先生还有一些文稿尚未结集出版,以后恐怕也是难见天日。苏教授向后仰了仰头,长叹一声说,朱老师作古了,而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至今仍然活着的古人。早些年,我追随朱老师一起走进了古代,现在已经回不来了。哎哎,回不来了,回不来了……苏教授说了一连串“回不来了”之后忽然又问我,有没有看见我老伴回来

过？我说没见过。苏教授陡地沉下了脸色，不知道嗫嚅了一句什么。他低头穿过客厅走向书房时，在一株百岁兰边上停留片刻，把烟头按在兰叶上，就像按住一个人的脑袋那样一直不松手，直到叶片烫出了一个焦黑的小洞。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苏教授的身上开始出现了温和的暴力。

天气闷热，苏教授却一直没有打开窗户，仿佛生怕一缕细微的南风搅乱内心的某种秩序。隔着一扇门，我依然能听到苏教授在书房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午后轻微的倦怠催人欲睡。保姆小吴刚刚换洗了杯盏，走过来轻声告诉我，苏教授方才想写一篇怀念朱先生什么的文章，只是写了开头两行字，就掷笔站了起来。一定是天气的缘故，她说，这样的天气又湿又热，连地板都不好擦，更何况写字！我们的小吴有点像唐诗中的那种怨妇，时常对眼下这种炎热的天气发表几句怨言。她肯定我也安坐不住，因此就在我身边坐下来，不厌其烦地跟我聊起自己的情感历程。她聊得最多的是一个又穷又懒的小白脸。那个小白脸也很无聊，居然借她的钱去嫖娼，被警察逮住了，还有脸哀求她拿钱去保人。她说到这里，不失时机地要求我对她表现出来的宽容和仁慈发表几句赞美之辞。她是一个对生活 and 男人都失去信心的女人。她觉得生活很无聊。她只是为了弄出点声音才跟我聊天。因为无聊而聊天，终归是无聊。就像我，因为无聊而读书，因为无聊而写点东西。

在朱仙田先生的追悼会上，苏静安教授作为大弟子兼治丧委员会主任发表了几句感言，感叹的也无非是天时人事的无常。轮到王致庸教授讲话时，他还没走到麦克风前，突然一个趔趄，重重地摔倒在地，继而四肢抽搐，人事不省。会场上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赶紧叫来了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往医院救治。追悼会草草结束之后，我便陪同苏教授一起回家。天气闷热，我打电话让所里派车来接，但苏教授挥手拒绝了。苏教授说，从殡仪馆到家门口，只需要坐三路车再转九路车即可，不需要麻烦人家。于是，我就扶着苏教授上了电车。车上坐满了人，

有个年轻人欠身让座,但苏教授看到座位上写着“老弱病残孕专座”的字样,就拒绝坐下了。那个年轻人嘟哝了几句,旋即又坐下了。因为我一手搀扶着苏教授,一手握住车上的扶手,所以一时间腾不出手来买票,售票员连续向我催喊了几声,声音里含有几分怒气。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掏出几个零钱,递了过去。

下车后,苏教授望着绝尘而去的公交车,忽生感慨,他说,有两种人,是常常向人伸手要零钱的:一种是乞丐,一种就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乞丐的生活是没有方向的,而售票员的生活呢,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有方向的,但他们每天叠加起来的生活又会是没方向的。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每天看起来都好像是有所事可干的,再回过头来,又觉得什么事也没做成,仿佛我们的一生都是无所事事的。我不知道苏教授为何突然要说这样一番话。他讲话的语调跟上午念悼词的语调有些相似,仿佛是在哀悼过往的岁月。

上午九点,我又准时来到“梅竹双清阁”。苏教授头发蓬乱,趿着一双拖鞋,正坐在沙发上埋头看报纸。见我来了,只是点点头,也不作声。我不敢拿正眼看他,悄悄走进了那个小书房。我把桌子擦了一遍才落座。小吴给我泡了一杯茶,搁在桌边,然后轻声告诉我,苏教授今早起来,脾气古怪得很,既没有出去散步,也没有吃早餐,就这样愣坐着看报纸。我透过书房的玻璃,刚好可以看到苏教授的侧影。他还在翻来覆去地看报纸,整个上午的慵懒和倦怠便深深地陷进松软的沙发。看样子,他昨晚似乎没睡好。这种情形是很少见的,苏教授向来是日食夜宿,生活有度,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此,我疑心他是患了报纸上所谓的“老年抑郁症”。没过多久,苏教授忽然从沙发上弹跳起来,把一份报纸递到我跟前说,他发现报纸上有三个错别字。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了三个字的来历与用法,得出的结论是:看报纸容易让人变得智力低下。尽管如此,他还在翻看报纸。而报纸上的错别字仿佛变成了鞋底上的一粒沙子、牙缝间的一片菜屑,让他觉着很不舒服。最后,他终于按捺不住了,往报社总编室打了一个电话,把他花了一个